

“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史的考察

常 樂*

將“一帶一路”和“一國兩制”兩個看似並不怎麼相干的概念和實踐聯繫在一起，並不僅僅因為奉行“一國兩制”理論和政策的港澳地區是國家“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新戰略體系中的重要樞紐，兩地會在其中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為重要也更為隱蔽的是，如果將二者放在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中國命運及其與世界關係變動處理的歷史脈絡當中，或許就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着很多相似性，發現二者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和處理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關係的重要理論、戰略和政策節點，是中國從沒落帝國走向獨立國家、世界大國，以至世界強國的重要戰略步驟。因此，“一帶一路”和“一國兩制”之間存在着明顯的承遞、疊加和延展關係，認識到二者之間這種內在的、同質性的緊密聯繫，對於進一步彰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都會有很大助益。

一、異質性的價值、組織和理想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階級出現，異質性的社會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統治者對奴隸、農奴和平民實施赤裸裸的自上而下的殘酷壓迫，底層社會很難與統治者相抗衡，更沒有公開化、合法化的平台與手段與統治者進行和平性質的鬥爭。伴隨着世界地理大發現和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民主公平等資產階級學說

勃興，並且深入世人腦髓，自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後，統治者對民眾的自上而下的殘酷統治一去不復返了。一方面，舊的封建王朝紛紛瓦解，朝着資本主義方向演進；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異質性的政治力量、政治組織、政治理論相繼產生，雖多所傾軋，但也能保證弱者的合法立足。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和勞動工人之間具有天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最起碼的形式民主背景下，代表廣大勞工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必然會破土而出。從階級基礎來看，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無論其價值訴求、政治理想以至組織原則，都是異質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從一開始，無產階級政黨是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則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大聯合、最終實現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而手段則是武裝革命。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力量的強大、革命的破壞性以及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工人的分化瓦解，即使在社會主義理論最為世界所關注的 19 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在英、法、德、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反而是在“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俄國”出現了。這時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二、市場經濟的共生環境

隨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財富的不斷積累，民主制度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工人運動的持續抗爭，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破壞性不斷增加的經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教授

濟危機的爆發，等等，這些都促使西方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反思其政治制度，尋找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方式、方法和方向，最終改善廣大勞工階層的物質生活水準，提高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地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享有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權利，就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國家施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向，而福利制度、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則是其保證兩大階級和諧並存和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制度基礎。¹

外部社會和制度環境的變化，也導致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原有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理念和鬥爭策略的改變，其基本點就是與資本主義政黨和平共處，通過政黨制度影響政局和社會，通過選舉制度獲取議席，影響政策，甚至執政。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的中華民國時期，市場經濟發展尚處於十分薄弱的初級階段，資產階級力量及其政黨和無產階級力量及其政黨都比較脆弱，在加之外面臨共同的敵人——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二者的合作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選擇。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共產黨部分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但保留中國共產黨獨立的組織地位。合作後實施北伐，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納入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政府體系，接受後者的領導。合作後實現了全民族抗戰，最終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

這一歷史時期，東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都存在共生、共存、合作、共贏的態勢，但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總體而言，西方是民主體制下的共生、合作，異質性程度降低；中國是分裂、鬥爭背景下的共生、合作，異質性並未消滅，甚至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加強；西方的共生與合作，通常由資產階級政黨主動、主導，而中國的共生與合作，則是中國共產黨主動、主導，這裏面其實已經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政黨的深入認識和較深理解。

三、新中國的共融實踐

新中國成立之後，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對資本主義都採取了相對包容的態度，雖然不時受到“左”的錯誤路綫的干擾，但是總體上還是保留了與資產階級政黨及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的空間。在國內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採取了兩個方向的共融道路。一是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產業：新政權認識並看到了“資產階級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一面，因此“國家用贖買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企業收歸國有”，“用贖買的方法，是根據我們自己的情況決定的，國家有能力把他們的企業拿過來，給他們一定的利息。”² 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方面的改造，從建國初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條共融道路主要表現在政治領域，就是建國後中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政黨制度的本質和鮮明特點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與，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親密合作。³ 這裏面的“多黨派”，就是在解放前成立的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八個政黨。它們與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緊密關係。

在對外方面，中國共產黨也確立了兩條共融的發展道路。一是確立了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後，一方面是國家發展的底子很薄，一窮二白；另一方面是實行社會主義國家，被資本主義所孤立、封鎖。這對於新中國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新中國一方面加入由蘇聯所主導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另一方面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希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來改善國家的經濟面貌。還有一層深意，就是希望向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獲得他們的幫助。1963年12月，鄧小平曾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是科學技術先進的國家”，“我們是一個大國，但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我們歡迎日本朋友在這方面給我們幫助”。⁴ 在十年之後的“文革”期間，鄧小平的這一感受更加緊迫。他說，“我們很希望能得

到西方的一些先進的技術來進行我們的建設。我們願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下發展同世界各國的貿易”；“我們的原則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進行各方面的友好往來”。⁵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先後與法、英、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不斷爭取與世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二是在與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接觸的過程中，在中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構想，並通過港澳基本法的制定，最終在港澳回歸祖國以後付諸實踐。⁶ “一國兩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且這兩種制度遠非“等量而齊觀”，內地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後者是對前者的補充。“一國兩制”的最大目的，就是能夠充分保障和利用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利因素，並在和平條件下以最小的代價和最短的時間實現國家的最終統一。從港澳回歸以來的實踐來看，“一國兩制”理論和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得到了世界範圍的廣泛認同。

很明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共同融合發展問題，是世界範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交叉融合發展的一個交集和縮影，也是一個最佳的代表。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它們從最初的兩大陣營政黨的對立到合作，再逐漸走出國門，開始與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合作；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就開始與資產階級政黨和政府有過緊密的合作，到了新中國成立，為着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更加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因素，其合作由外在逐漸內化，由短期的階段性目標，到長期的終極性目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合作關係，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關係。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作與融合有一個明顯的承遞關係，也有一個明顯的疊加關係，二者之間的互動性也很明顯。正是有了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先進性的認識，才有了隨後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反過來又進一步加深了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隨之確立了“一國兩制”偉大戰略構想。這些思想、理論、政策和實踐都密集的發生在上世紀

七、八十年代，其前後的一致性、協同性、共生性一目了然。

四、世界的共同繁榮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更加明確、更加清晰地考慮和解決國際國內問題。國內，主要考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問題，通過“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來逐步落實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國際，主要考慮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如何讓世界人民分享到中國的發展成果、進而實現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繁榮和穩定。在這兩大目標的統領下，中國共產黨在對待和處理資本主義問題上的理論、戰略和政策又出現了新的發展。

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提出。十八大報告首次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指出“要宣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從表面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好像是各國間貿易往來的一個市場和行為準則，實際上，它是一個全球治理新理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7 次集體學習時所強調的，“要推進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理念”。而這一全球治理理念，不僅是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和對當今時代特點的把握，更是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對待資本主義和治國理政領域的重大理論突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突破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是代表發展中國家向全世界發出的時代最強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發展中國家走向富強、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和平發展、繁榮穩定提供了理論智慧和制度框架。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以中國為中心，呈現出清晰的圈層和遞進結構。首層是由 56 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次層中國大陸與港澳台兩岸四

地組成的更大範圍的命運共同體；第三層是中國與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命運共同體；最外層是中國與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所有地區組成的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圈層和遞進特色既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對中國國際地位、國際交往、外交原則、立國之本等領域實踐的理論總結，也為實現該理論所作出的戰略部署和決策指明了方向。

最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且能體現該理論特色，並邁出全球治理第一步的國家戰略和政策框架就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從“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之後國內沿海、沿江、沿綫地區的發展熱潮，到中國與東盟、南亞、非洲、拉美，以及近日與英、德、法、荷等西方大國的經貿人文合作，再到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的群起回應，以中國為中心帶動亞、歐、非等國家發展的態勢已現雛形。

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要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圈層和遞進理論特色，注意其實施的層次性和遞進性，處理好優先、重點和難易、利益的關係。首先是中國沿海、沿江、沿綫地區的協同發展，其近期目標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次是中國與港澳台兩岸四地的協同發展，其中長期目標是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再次是中國與周邊地區的東亞、南亞、中亞以及非洲等發展中國家聯動發展，旨在實現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安居樂業；最後是中國與亞太及歐洲地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均衡發展，旨在謀求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的共同繁榮。

當然，“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圈層性與遞進性，只是一種戰略佈局和戰略意圖，並不一定要機械化和程式化去理解和執行。這裏面還有一個戰略部署和策略靈活的關係要處理。比如在亞投行建立的過程中，其建設重心雖然在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但是從實際財力和未來發展佈局就不得不盡可能吸納更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進來。再如，亞非等不少發展中國家國內局勢持續動盪、經濟發展落後、公共基礎設施闕如，本應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點區域。但是由於其貧困的長期性和累積性，以及局勢、政策等的不確定性，反而不易開展合作和

建設項目。反觀歐洲英、法等發達國家在經歷金融危機打擊之後，在實施再工業化和一些地區復興計劃的過程中也面臨較大資金缺口，在社會和民眾的廣泛壓力下，其發展與合作訴求反而更加急迫。並且，健全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營商環境、成熟的合作項目等等，也是相關合作容易在發達國家落地的外部因素。

另外，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視和發揮港澳地區優勢與作用。港澳地區奉行“一國兩制”，其最大優勢就是由“一國兩制”所帶來的制度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合作的優勢。而這兩點都是在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交往合作當中必須要面對、利用和處理的兩大制度範疇。港澳地區的另一大優勢是國際化程度。港澳地區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兩個城市，都有長期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穩定市場、成熟制度和人才資源，這些資源與內地相結合，將會給“一帶一路”實施帶來事半功倍的效果。總之，港澳地區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既可以率先走出去，發揮先導效應，也可以參與扶助內地企業，發揮協同效應。

五、兩大社會制度相伴而行

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政黨及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從其產生開始，矛盾、衝突、鬥爭、合作都未有間斷。但是從近兩百年歷史來看，二者之間的鬥爭因素在降低，合作程度在加強，其合作歷史已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階段性、策略性的合作，衝突與鬥爭仍佔主導地位；二是戰略性、全面性、長期性、合法化的合作，間有隱蔽性或公開性的矛盾和爭論，以合法化、公開化、常態化的政治途徑展開批評和競爭；三是跨區域、國際化、制度化的合作，兼有區域性、歷史性、意識形態性的議題衝突。

在西方國家，兩種制度和兩種意識形態是通過選舉制度在議會這一合法渠道開展合作與鬥爭，通過選舉和政策議題的博弈，雙發相互吸收和接近，同質性增高、異質性下降。在中國，兩種制度和兩種意識形

態的合作與鬥爭是通過“一國兩制”或者新的世界治理體系建構和形成過程中以跨區域合作的形式出現的。“一國兩制”下的兩種制度，如同體操中的高低杠，是一種存在高低之分、平行運行的結構，重在充分發揮兩種制度各自的優越性，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取長補短、借鑒利用。而跨區域的合作與鬥爭，比如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則更為隱性、包容和克制，和平發展、互利共贏是沿綫國家所追求的最大公約數，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僅被視為交往成本，甚至是交叉優勢的重要來源渠道。

在處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關係問題上，“一帶一路”戰略的出台和實施，是中國在實施“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之後的一個重要飛躍，它將中國共產黨認識和處理資本主義問題從國內範圍躍升和推廣到國際領域。正如前述，“一帶一路”表面看是經貿合作交流，實質是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更深層看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認識深化和拓展。從這一視角來看，“一國兩制”和“一帶一路”是中國共產黨認識和處理資本主義問題的兩個重要戰略，兩個重要節點，兩個推動中國融入世界重要制度性樞紐和實踐性平台。前者重在解決國家的和平統一問題，遠期

目標則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後者重在解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遠期目標則是建立全球治理新體系，同時連帶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兩者都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步驟，它們以及各自的連帶效應都大大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由此延伸下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雖然以人的生命意識為基本脈絡，以國家為界限，將全世界不同國家和社會制度之間的人民的生命和命運共同聯繫起來，構建一個全世界都可接受和認同的共同話語體系。但其深層目的和意圖，則是淡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淡化民族與文化，以構建旨在保障世界和平、謀求人類幸福的制度共同體。這一制度共同體，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制度，二者的合作、和諧保障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健康穩步發展。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指導下，兩大制度共同體的合作範圍會進一步加大，合作程度會進一步加深，相互吸收借鑒的成分會隨之提高，全球治理新體系會有序建成，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也會更加深入人心。

註釋：

- ¹ 這種趨勢性的變化基本上是中西方學術界的共識。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劉鶴特別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危害性的角度，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融合問題。他說，“(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蕭條後，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見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載於《比較》，2012年第5期。
- ² 《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7頁。
- ³ 李凱：《胡錦濤：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適合國情》，載於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1/content_2002226.htm，2004年9月21日。
- ⁴ 同註2，第169頁。
- ⁵ 同上註，第315-316頁。
- ⁶ 港澳問題其實是中國的內政。但是，從港澳問題的起源、回歸談判及聯合公報的發表、資本主義等異質因素的融入等角度來看，也可將它們納入中國共產黨所處理的對外事務範疇當中。由此，“一國兩制”既可視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內政的國內戰略，也可視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國際戰略。